

我最初是从在北京语言大学任客座教授的女儿申师明那里看到了《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杂志,因为是朝鲜语,没有阅读上的障碍,我在第一时间便通读了全书。创刊号中翻译发表了多个中国多个民族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内容非常丰富。于是便萌生了去杂志社看看的想法。

11月中旬的北京,天高云淡,空气中虽已有些凉意,却也使人神清气爽。看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标志,出租车把我放到了正门口,一下车,青灰色的大楼便映入眼帘。

民族文学杂志社便在这座位于北京农展馆南里的大楼里。除民族文学杂志社之外,这里还有《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和作家出版社等中国文学界重要的报刊社,这里堪称催生感动全中国千万人民的文学作品的“产房”。

在办公室等待我的是叶梅主编与分管5个少数民族文字版的石一宁副主编。叶梅是知名的土家族作家,目前创作仍十分活跃,最近还发表了《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等小说、散文作品。我也有幸获赠了她的散文集《大翔凤》,她介绍说,“大翔凤”(胡同)是杂志社的另一个办公地点,是“展翅翱翔的凤凰”之意,这一意象与我对《民族文学》的印象不谋而合。石一宁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他也送了我一本自己的散文集《湖神回来了》。我后来了解到,叶梅退休后,由石一宁接任杂志社的主编。我想,大概是因为两位都是活跃在创作一线的作家、评论家,所以《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刚刚创刊不久,但创刊号作品选择独具匠心,编辑都充满活力,已然显示出了如《三国演义》中赤兔马“奔腾千里荡尘埃”的气势,今后定能给读者们带来更多的感动。

“为促进中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党和国家在办刊经费等方面给予《民族文学》极大的支持,《民族文学》朝鲜文版2012年9月正式创刊,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得到中国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也非常期待通过朝鲜文版杂志这一媒介,今后能够更多地与韩国进行文学上的交流。”叶梅主编爽朗地说道。

行走

安息山的记忆

□张同吾

一种庄严的正义之声,像洪钟般在天空和大地回响,全国人大常委第七次会议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表达了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9月3日和12月13日是两个息息相关、血肉相连的日子,前者是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是悲伤和喜悦的泪水一起放纵奔流的日子,正如诗人李瑛写的:“这一天终于来临/八年抗战我们没有哭泣/此刻,让我们抱在一起/任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而后者则是凝聚国之殇、民之恨的日子,南京的30万同胞惨遭日军灭绝人性的屠杀,确定公祭日的意义就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牢记战争灾难,表明中国人民世代维护国家独立、捍卫人类尊严的坚定立场。一切有尊严的国度和有良知的人们,都会以相似的形式警示世人牢记历史灾难,祈望世界和平,因而我想起出访以色列时的感悟。

1993年是中以建交的第二年,中国作协派出由张贤亮、张宇和我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以色列,张贤亮任团长。耶路撒冷被称为“圣城”,当我们走出一座又一座洋溢着浓浓的宗教色彩的教堂之后,便去参观大屠杀历史纪念馆。大屠杀历史纪念馆建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安息山上,我们从停车场沿着一条整洁的柏油路向高处走去,安息山是安宁的,就连来这里参观的游客们都是庄严肃穆的。这条路叫正义路,其命名像安息山一样富有诗的意蕴——愿死者安息,愿生者从这里走向正义之门。路旁种植了一些不知名的树,根深叶茂郁郁葱葱。我们缓缓地走着,陪同我们的阿米尔大使说,在“二战”时期有600万犹太人被德国法西斯屠杀了,其中包括150万儿童。以色列建国后于1951年在这里修建了纪念馆,是让后人永远记住民族深重的灾难。在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中,人的良知并未泯灭,仍有一些善良的德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把犹太人隐藏起来而使之得以幸存。建国后的以色列向许多国家发出通知寻找恩人,经过资格证实委员会的鉴定,把恩人们陆续请来,每人在这里种一棵树。我发现每棵树下都有一块小小的石碑,镌刻着种树人的姓名,顿时我便对这些树有了感情,因为它们是人类良知的纪念碑,树林四季常青象征着人类的善良之心长存。在这片美丽的树林里,我心中升腾起一种纯净的诗情,就从树上摘下两片绿叶,很平整地夹在日记本里,好让我朝朝暮暮能听到一种超越世俗的清纯之音的流动。

大屠杀历史纪念馆是由各自独立的展厅、画廊、刻有受害者名单的大厅、档案馆和各种纪念馆组成,每座纪念馆都设计得新颖别致,富有艺术感染力。在中心大厅入口处有4座抽象派的巨型浮雕,或者说是由立体雕像与浮雕组成的图案,雕塑本身并不抽象,而是现实主义的并不夸张的艺术造型,但不规则的组合却具有了象征意味:妇女把烛台插入乳房,象征犹太民族正在承受巨大的苦难(在以色列处处能看到烛台的各种艺术造型,国徽也是一个七枝烛台,其形状是仿照一种长青的古代植物。为了不忘昔日苦难,迄今仍有许多以色列人在星期五的夜晚点起烛光)。幸存者高高挺立,身体却被弯曲,一手握剑正与敌人搏斗,一手握梯是呼吁援助,然而他们是无望的,因为太阳已被夺走。船在浪海中疾行奔向光明,粗大的箭头代表前进的方向,一条腿伸出船外,暗示即将登岸开始新的生活。雄狮站立起来,妇人高举烛台——象征以色列独立。这4座组合雕像,构成了他们国家现代史的浓缩。

展厅里许多放大的照片,把我们带回50年前那段血腥年月——刽子手的狞笑、依附者的谄媚,尸横街巷、血流成河。我在一张照片前停住了脚步,持枪的德国士兵把一群犹太女和儿童赶进了集中营,之后赶进毒气炉毒死。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头戴鸭舌帽,穿一身花呢西装,长得非常漂亮,他紧攥着妈妈的衣袖,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乞求和绝望。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神情,顿时感到心在颤抖,我突然懂了:当人性泯灭的时候,人比野兽更凶残!

在耶路撒冷的教堂里,我曾惊讶地感觉到宗教的肃穆同艺术的辉煌相融合的时候确能震撼灵魂,而此时此刻我又发现,当爱国情同富有人性魅力的艺术匠心相统一,却能净化心灵。在艺术画廊里我看到一堆儿童鞋组成的雕塑,给人的感觉是堆积如山无法计数,暗示那些天真活活的孩子们都被屠杀了。面对这堆鞋,我仿佛听到了一片撕肝裂胆的哭声,这哭声久久地在耳边萦绕,他们的摇篮、他们的课本、他们的蓝天、他们的梦幻为什么要毁于瞬间?这里展出的雕塑和油画都是幸存的艺术家的作品,惟有他们才能对生与死、爱与恨有着深刻的体验。我们走进儿童死难纪念馆,这里没有任何实物展览,大厅里一片幽暗,我们用手扶着甬道两侧的栏杆慢慢向前移动,看到点点烛光通过玻璃的多重反射和折射,像是无限的天宇里闪烁着无数的星斗,那是孩子们莹亮的眼睛,那是孩子们透明的心灵,那是孩子们的生命之光,冥冥中向你呼唤,同你低语,站在这里我们竟然失声痛哭!

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我们告诉阿米尔,当希特勒疯狂地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正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践踏,他们以同样惨不忍睹的手段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现在,我们勇敢地捍卫自己的主权却永远不侵略别人,倘若各国都能如此,才能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我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中,深切感悟到,不管日本的一些政治狂徒怎样声嘶力竭地企图掩盖历史罪行,都不会泯灭人类良知,都不能阻止人类的觉醒。3年前,我率领中国诗歌学会代表团赴韩国首尔参加第三届中日韩诗人大会。在闭幕式上,日本诗人冈隆夫用英语发言,而大会没有配备英语翻译,我们不知他之所云,他讲了几句之后向台下深深鞠躬。这时坐在台下的中国诗人、翻译家顾子欣大声翻译:“他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韩国人民犯下了罪行,我向你们深深道歉!”

当时,我正坐在主席台上,立即走下与他握手,我让韩国翻译把我下面的插话一句一句地译成韩语和日语。我说:“感谢冈隆夫先生对这场战争的理解,一切有良知的日本公民都会认同。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我们不会忘记过去!但我们更珍视现在和未来,当前中日韩三国人民和全人类都为营造幸福生活、祈望世界和平而努力。中日韩三国人民和三国诗人的友谊万岁!”那一刻,全场掌声雷动,我深切地感觉到,正义和良知有撼天动地的力量。

讲述

与中国文学结缘

□(韩)申相星

我与两位主编共同探讨了韩中文学交流的前景,双方很快在作家和作品交流上产生了共鸣。细读了《民族文学》朝鲜文版创刊号之后,铁凝的小说《咳嗽天鹅》、益希单增的小说《向南还是向东》等作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我提出推荐几篇作品参评2013年初在韩国进行的“第二届亚洲金狮文学奖”。这些优秀作品是此次与《民族文学》结缘的一大收获。《民族文学》朝鲜文版是我们了解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一个窗口,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不断地译介中国各民族最新的优秀作品,我们有理由期待它在未来成长为“多民族文学的摇篮”,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一场“中国文学飓风”。

多年来,我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中国一地,我都要去当地的文化古迹走走。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集中了许多“文学名所”,如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纪念馆、老舍故居、郭沫若纪念馆等等。延吉和长春等地,是朝鲜族聚居的地方,朝鲜族文学十分活跃。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延吉参加延边大学或延边作家协会举办的各种文学活动。与小说家郑世峰、文学评论家张正一、诗人南永前等文学界的朋友由于年龄相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常聚在一处谈文学,也曾一同探访尹东柱故居,拜访金学铁一家。

如果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教父”,那么李光洙便是韩国现代文学的“教父”。在绍兴的鲁迅故居,与(大韩国)上海临时政府旧址看到了独立运动家金九与李光洙的旧迹。据说20世纪20年代,李光洙与金九曾在上海共谋抗日救国。另

外,鲁迅在北大任教期间,韩国知名抗日诗人李陆史曾在北大的研究所躲过了日本警察的搜捕。

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东京的李光洙、廉想涉、金南天、鲁迅、郭沫若等热血青年为如风中之烛的国家民族忧虑,面对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这一共同的敌人,中韩两国的进步青年同仇敌忾、互通有无。这种联合在1919年接连促成了韩国的“三一运动”及中国的“五四运动”。

我与中国结缘最初是在1990年。那时中韩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我受政府委派参加“亚运会”期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发言。从那以后,我开始沉迷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最吸引我的是中国五千年盛衰兴亡的风云背后蔚为大观的思想哲学史,是从屈原的楚辞到清代的《红楼梦》一脉相承的文学气蕴。

一个国家的文学,必然呈现出其民族特有的心性和气质。朝鲜半岛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历史上多次遭到外来侵略,故在李光洙、金东仁、金东里等韩国作家的小说里都饱含着一种独有的“恨”。比较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会看出两国文化气质的不同。中国的小说与俄罗斯文学,两者同样善用心理分析,且长于表现复杂微妙的人性,却有各自独特的风格。虽然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广阔的疆域,文化上都有相似的“大陆特质”,然而中国文学给人一种如春日里西湖边杨柳般细致舒展的美感,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往往使人联想到西伯利亚严冬中孤独忧懔的白桦。

汉字和古典文学是韩国大学国语国文专业的必修课程。



张鸿/图文

如果老奶奶还活着,她95岁了。

2006年我独自在云南行走,进入怒江大峡谷,想一路去西藏察隅县。到了茨开镇才知通往察隅的路因塌方无法通行。我一转念想经独龙江进入孔当,去看看文面女。吉普车在悬崖上凿出来的山路上蠕动,96公里山路走了8个小时。

独龙江夹在高黎贡山和缅甸的担当力卡山之间,每年12月到次年5月,大雪封住通往外界的惟一一条步行的路,人们只能在天寒地冻中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当地人那里有“吃人的多,人吃的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身无全衣”。

开车送我进山的傈僳族小杨师傅在孔当遇

上了他的朋友李校长,小杨告诉我我想去看文面女。校长答应了,他让我们把裤腿扎紧,把脸蒙上,而后带着我们穿过蚂蟥区到了猷九当村。他领我们去年纪最大的一位文面老奶奶家。

老奶奶不在家。我们一坐下,老奶奶的孙子福林就把米酒端了上来,我们围着极简易的火塘,烤着火。校长告诉我,老奶奶和儿媳上山采草药去了。过了一会儿,一位脸上文满了花纹的老奶奶和一位大婶回来了。我不知道奶奶叫什么名字,大家叫她“晒”。她坐在火塘边几块木板搭起的床上,床上有一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破毡毯子,与她身上的衣服以及我手中的搪瓷碗一样。

我把手中的米酒碗递给老奶奶,她笑了,小

心翼翼地喝了一口又回递给我,我喝了一口,又给她,她笑出了声,喝了一口又递了过来。福林说,奶奶87岁了,先后嫁给了爷爷兄弟两个。

我要给奶奶拍照,她起初似乎不愿意,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抚弄着头发。福林说,奶奶要打扮打扮。她从薄薄的床垫下取出了一块鲜艳的独龙毯,福林的妈妈麻利地替她斜披在身上,打了一个结。她看着我,不好意思地抿嘴笑了。

将近8年过去,有关独龙江的记忆尤新。生活在大山深处、高山之巅的他们生存条件是否有改观?是否衣食无忧,照明也用了电?

我将“晒”奶奶的照片作为我电脑的背景图。不知道她还好吗?

一个中国农民的梦想

□高艳国

咬,不知睡了多少回牲口圈,3年的乞讨生涯里,梁希森依旧是饥一顿饱一顿。别说是烧热的没有剥皮的土豆,就是一块生红薯,也是梁希森日思夜想的美餐。小时候怎么那么饿啊?直到成为亿万富翁,梁希森面对我的采访,依然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背负着这种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只读过一年书的梁希森,

后来学徒打铁,倒卖棉皮,卖花椒调料,搞面粉加工,开馒头房,办毛巾厂,组建装修队、建筑队,这一切一切的寻找、创业、转型和突破,无不是为了心中的一个想法:吃饱肚子,不再挨饿。

1996年的正月初六,梁希森带领200多名农民兄弟组成的装修队、建筑队,浩浩荡荡开进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第一个别墅区项目——北京玫瑰园的建设现场。靠着农民干活的一股实在劲儿,还有随车拉去的几千斤白菜、粉条、馒头和咸菜,梁希森和他的农民兄弟在北京玫瑰园干得热火朝天,风生水起。一年过去了,甲方却因资金问题,拖欠工程款达亿元。为了不让农民兄弟倾家荡产,梁希森又用了两年的时间,与甲方斗智、斗勇、斗法,终于以最大债权人的身份成为北京玫瑰园的主人。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搞得了房地产?就在业内人士瞪大眼睛等着看梁希森的“大败局”时,农民梁希森却以他特有的天赋和胆量,连连出招,使北京玫瑰园不仅在短时间内开盘销售,而且二期大卖了3个亿。由此,农民梁希森成为中国房地产生出的一匹黑马。梁希森说:当时就一个想法,得让城里人看看,咱农民不光能盖好房子,也能卖好房子。

成为地产富豪的农民梁希森,又有了新的想法。

他从首都北京回到家乡乐陵,投资4000多万元,为全村的老少爷们每家盖了栋别墅,让村里人从此住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房子。10年后,他的这项义举,成为德州新农村建设的开端之作。他说,阎王爷要命不要钱。咱一个人富了不叫能耐,带领全村人富了才是本事。

想法不断的农民梁希森,没有按照外界的猜想,继续复制他的地产梦想,而是从城市又回到了乡村,地产大亨摇身变成了土豆大王。从2005年开始,梁希森累计投资25亿元,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希森薯业公司,先后在德州乐陵、北京顺义、内蒙古商都、河北张家口建起了育种基地,全国第一个国家级马铃薯研究中心也落户乐陵。农民梁希森在种土豆的过程中,又真正找到了农民的感觉。尽管由于资金问题,他的土豆事业在近3年的时间里几乎止步不前,但他从不后悔。如今,他要与产业与资本嫁接,两年内完成希森马铃薯集团的上市目标。他说:“咱是农民,盖房子是一时的事,种地才是一辈子的事啊。”采访时,我曾问他:“梁总,10年时间里,你为中国的马铃薯事业着急上火、流汗吐血,图个啥?这育种本应该是政府的事儿啊。”他说:“咱农民吃饱了肚子,过上了好日子,也应该有点责任,替政府担点担子啊。”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在这片生活着8亿农民的土地上,有多少默默耕耘的梦想如一枚枚小小的土豆,在大地深处沉静地积蓄力量,萌芽开花……

